

中国故事

选择勇敢

□ 李朝全

今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中国作协组织一支作家小分队前往武汉一线采访。

在武汉,我们四个人如同并肩作战的战友。团队和集体的力量激励着我们彼此,这,大概也是个人能够勇敢面对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为什么会勇敢?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白衣为甲,奋勇出征,践行医者仁心和不惧生死、一心赴救的誓言。这群平时拿手术刀拿注射针把脉问诊按摩护理的医护人员,瞬间变成战士,英勇上阵,主动担责。他们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他们用身躯和技术共同打造了一道铜墙铁壁,将病毒阻断在医院病房之内,强有力地捍卫了14亿中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勇敢呢?尤其是其中占半数以上的医护人员都是女性,这些常常被认为是温柔脆弱甚至胆小的女孩,她们为什么能在灾难降临之际英勇出征呢?这是我一直在苦思冥想试图求解的问题。是因为她们生而勇敢吗?是因为在大难面前被激发出的勇气与担当吗?是集体主义的力量让她们抱团取暖相互激励与鼓劲吗?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完全是。

田芳芳,这个来自湖南的湘妹子,她出生在医护世家,有着助人济世的家风传承,父亲曾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她在战役伊始就义无反顾英勇上阵,她的勇敢来自血缘、家风的传承,来自湖南人的泼辣善良和敢为天下先的禀性。

余沙,这位汶川大地震的幸存女孩,她说自己还没有结婚也没有男友,无奈无挂,再三申请奔赴武汉参与抗疫。在她看来,这是一种道义,是人性人情天道的自然表现,知恩回报是人之常情。

张静静,这个5岁孩子的母亲,在奔赴湖北抗疫的战场时,她不可能没有顾虑和担心,但是,职业的尊严、荣誉激励着她,同事们的斗志鼓舞了她,从死神手中抢回病人的成就感振奋了她。她深知,自己就是病患的希望,她将自己的力量和信念传递给患者。

人的勇敢,有可能来自天赋、禀性,来自自信、信仰,也有可能来自爱、真情、尊严与道义,更有可能来自职责、使命与担当。在灾祸与苦难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勇敢。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过后,我独自到映秀镇去采访,因为所有的公交线路都已停运,我只好都在都江堰租了一辆出租车。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出租车费涨价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四川的司机似乎没有这个想法。在马路边停着多辆出租车,我问迎面遇到的第一个司机:去映秀镇往返,还要在那里逗留一两个小时,需要多少钱?师傅回答:260元——这让我大出意外,因为此前前往映秀镇估计有80公里,这个报价应该就是平常时期的往返车费。时间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在出发之前,司机专门给他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自己要送客人去映秀镇,可能很晚才能回家,让她不必担忧。

然后,他就开着车载着我,一路颠簸在那些像被地震抽断了脊梁骨的桥梁和道路上,沿着岷江边山脚下蜿蜒曲折的道路蹒跚前行。道路破烂不堪,许多地方都是被救援车辆碾压出来的沙石路。

缓缓行驶了大约一小时,经过一处严重的塌方路段,塌方体估计有近百米厚。司机告诉我,这里是山体滑坡倾泻而下的沙石,下面埋压着几十具尸体。他是在我们驶过了这段路之后才告诉我这个消息的。灾难无情,生命竟如蝼蚁!塌方山体至少有几十万立方,重新挖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那几十条生命,或许将永眠于此!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映秀镇。天逐渐地黑了下來。映秀镇几乎变成一片废墟,一座空城,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多小时,然后驱车返回。

在回来的路上,天几乎黑尽了。一路上都没有路灯,没有光亮,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我们的汽车打出一道前光。宇宙浩瀚,仿佛只有我们这一辆小汽车行驶在茫茫的黑暗中,行驶在空无一车、毁坏殆尽的岷江边的公路上。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似乎成了地球的孤儿,司机和我变成了同舟共济、相依为命的两个人。

司机沉默着,小心翼翼地向前行驶,

就要经过那段塌方路段时,突然,我们同时听见了“轰隆隆”的一声巨响!

司机显然被吓坏了,他连声说:“糟了!糟了!很可能是前面的山体滑坡了!”

我倒不是心底坦然,自信天无绝人之路,车到山前自有路。一路上,我不停地同司机聊天,让他放松下来专心致志地开好车。

这时,天开始下雨,越下越大。破败的道路泥泞湿滑,视野更加模糊。我依旧不停地和司机说着话,安抚他不要害怕,相信自己,相信善良的力量……

司机一直都沉着,一言不发,仿佛心事重重。过了不知多久,司机的手机突然响了,电话是他妻子打来的。他告诉她,都江堰城里下起了大暴雨,刚才打了一声巨大的响雷,可把人吓坏了!

听到这个消息,司机马上告诉了我,他又变得有说有笑起来。他那颗悬着的心显然已经放下,因为他已经确认刚才的巨响是雷声而不是山体滑坡。

我们的车在暴雨如注中驶回了都江堰,回到城里时大雨倾盆。司机热心地帮我联系好了家庭旅馆。当我们到达时,就见旅馆的女老板打着雨伞出来迎接。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人间浓浓的善意和温暖。

后来,我又独自搭车前往平武县南坝镇石坎小学采访,途中要路过当时的第二大堰塞湖文家坝。在石坎采访时又遭遇了暴雨,我特别担心山体滑坡会被困在山村里,好在当地的村民非常热心,他们帮我截住了一辆运猪外出的卡车,我搭车离开了石坎村。

在经过文家坝时,果然遇上了山体滑坡,悬崖边的道路上几乎堆满积石,只在临近堰塞湖的这一面剩下了一条窄窄的一条道,司机远远地下了车,小心翼翼地仰望山体,细心观察判断,确认山上突出的石头暂时还掉不下来后,这才如履如临地启动汽车,缓如蜗牛般地驶过滑坡路段。当车到达了大马路上,我下了车,在路边等待从平武返回成都的公交车,我执意要付给司机100元车费,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肯收下。最后我坚持付了个他的地址,回京后给他的孩子寄去了一包书。

那段艰险万分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心有余悸的旅程让我终生难忘。但是在当时,在震后强余震频仍的灾区,我始终坚信,善良、善念和善意一定会让人勇敢,让人相信一切都会好好的。我就是凭借着这份信念一路走了过来,完成了一次艰难的采访。

因此,勇敢可以来自善念,来自对善的坚信。

今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中国作协准备组织一支作家小分队前往武汉一线采访。我给多家单位去电,征求意见。最终,两位湖南青年作家纪红建和曾散、河北作家李春雷奔赴武汉。在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后,李春雷都曾冲锋陷阵勇往直前。特别是在玉树,他遭遇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但却依然坚持采访,写出多篇精美报告文学。此次赴汉,他又不容辞勇挑重担,采写了多篇广受好评的精短报告文学。而纪红建以前当过兵,军人的荣誉感是激励他勇往直前的重要精神底色。曾散则是一位年轻的富于血性的青年,这几年他辞掉工作,一直行走在采访写作的路途上。他似乎根本不去顾虑采访过程可能潜在的。他的无畏,或许正是来自青年人的自信。

在武汉,我们四个人如同并肩作战的战友。一个多月后,在武汉“解封”前夕,我们各自都平安地回到了居住的城市。其间经历的种种潜在风险,已如同过眼云烟。团队和集体的力量激励着我们彼此,这,大概也是个人能够勇敢面对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

勇敢,是人的一种优秀品质。面对强权威逼,直面灾祸困难,遭遇艰难险阻,都敢于挺身而出,迎难而上,绝不退缩。勇敢来自自信,来自对个人精神力量和强大内心的信心。勇敢也可以由正义、道德和尊严所激发。它还可由血缘、家风、身份、职责与使命所赋予。

生活未必永远都是欢歌笑语,世界也并非总是阳光密布鲜花浪漫。勇敢,就是要赋予我们每个人正面各种各样的现实和即将到来的未来的勇气、胆魄和信心,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相信一切真善美的事物和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我的几位中文系恩师

□ 许文都

曾在边远省份一所高校教书,20世纪80年代,有幸得到来北京大学进修的机会,于是前前后后几十年,结识了北京高校中文系几位师长。虽然我从未敢自称是他们的学生,但先生们的教诲和风采却一刻未能忘,总想付诸笔墨。几位先生的学术成果与思想精髓早有他们的高徒付诸各类报刊,无须我置喙,这里就描几笔侧影吧。

谢冕老师,您咋不老?

几年前的一个正午,中国美术馆十字路口,马路对面一个人走在通往沙滩方向的五大街上,红光满面,步履矫健,这不是谢冕老师吗?我很想跑过去与老师打招呼,忽又觉不妥,老师是从一个会议上出来?还是去赶往另一个聚会?看那匆匆的脚步,还是不要打扰了。我遥望着老师远去的背影,突然觉得,也许这独自前行的身影,才是谢冕老师的常态。

我忆起1986年那个春节,正是诗坛“三个崛起”被搅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趁回家探亲的机会去探望谢冕老师,老师说:“这个春节过得很清静。”我愕然无语,又颇能理解地看着谢老师,是啊,趋利避害,人之本性,当天空乌云压下时,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自是躲避。于是,谢老师有了难得的清静,躲开喧嚣躲开了虚伪和繁杂。祸兮福兮?静潭深流,先生的思绪在那一段安静的环境中激烈地碰撞。不久,人们又一次

见到了先生智慧的井喷,那从不疲倦的身影又活跃在大大小小的会议和聚会上。他主持了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激活当代文艺批评,这些年,又组织编写了《中国新诗总论》等几套关于百年新诗的丛书,还一连出版了几本著作。

一次会议间隙,几个与会者围着谢老师在花园小径散步,周遭草青树碧,时令不对见不到花。一行人说说笑笑,不觉有淡淡花香袭来,有人说是栀子花香,有人猜测是茉莉花香,也有人说不,像玫瑰花香,独谢老师不语。大家东张西望,眼前仍是一片青碧,见不到那红红紫紫,疑惑间,有敏感者觉得那香气来自身后,齐转身,落在后面的谢老师忽然伸出手,掌心中,赫然躺着一个小小的香水瓶,众人认出这是宾馆为客人们准备的,笑闹声中,谢老师若无意地举着小小的香水瓶转来转去,脸上隐约老顽童的坏笑。一个小物件,便为众人营造出花香四溢的美妙

境界,这正是谢老师。处身青年学子间不多言语,总是满怀兴致地看着那些抢着说话的学生,或莞尔首肯,或垂眸凝思,偶尔一句提问,几句解释,三两个字的点赞,便能营造出全新境界。

最早知道谢老师,是看到他和夫人陈素琰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评作家张洁的文章,周遭草青树碧,时令不对见不到花。一行人说说笑笑,不觉有淡淡花香袭来,有人说是栀子花香,有人猜测是茉莉花香,也有人说不,像玫瑰花香,独谢老师不语。大家东张西望,眼前仍是一片青碧,见不到那红红紫紫,疑惑间,有敏感者觉得那香气来自身后,齐转身,落在后面的谢老师忽然伸出手,掌心中,赫然躺着一个小小的香水瓶,众人认出这是宾馆为客人们准备的,笑闹声中,谢老师若无意地举着小小的香水瓶转来转去,脸上隐约老顽童的坏笑。一个小物件,便为众人营造出花香四溢的美妙



是具有高级思维吗?思想不老,人便不老。

见到一篇写谢老师的文章,提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涌现的新作品新思潮新现象,会让研究者应接不暇,而谢老师却选择了这个难度大的专业。评者是在赞美老师的知难而进,我觉得不止如此。谢冕老师说:“当代文学日新月异,是一门不断生长的学科。”我以为,谢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断生长”的人,他的天性是接近时时出新、不断变化的时代,选择当代文学做研究

对象,初心绝不会是困难与否——尽管谢老师并不缺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正如谢老师那篇文章的标题:《在新的崛起面前》,面对一个“新”字,“辛苦”即是享乐。谢老师,您咋会老?想起您,眼前就会出现诗中描述的“总是少有闲暇的急匆匆的脚步,总是思考着的皱着的眉宇”(谢冕《永远的校园》)的模样。一位严谨的学者,一位不知疲倦的思想者,一个谢绝冠冕的老顽童,生命长青。

想起赵祖谟老师,不敢再叫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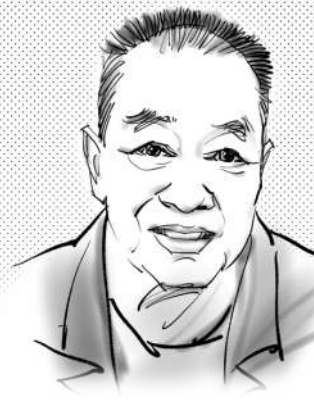
1984年秋,在北京最美的季节,我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指导教师是赵祖谟。那个年代的进修生是很幸运的,校方像培养研究生一样,根据进修生自己对研究方向的选择,给每个人配备指导老师,每周见一两次面,学生汇报读书进展情况,老师加以指导。正式拜访赵老师时我内心忐忑,不知该如何与老师交谈。进得赵老师在北大西门蔚秀园的家,普通两居室,没有特别的装修,落座,一杯清茶,温厚的笑容,爽朗的话语,顿时让我定下心来。老师了解了我的概况,问我是否给《当代文学研究》投过一篇评论王安忆小说的文章,我羞赧地低下头,赵老师却马上说:“写得不错,我们准备在第三期发表。”我惊讶地抬头看向老师,简直不敢相信,老师鼓励我说:“我们欢迎这种重视文本分析的文章。”后来我又告诉赵老师《文艺报》发表了我的一篇小说,赵老师对

我肯定后说:《文艺报》反映了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我希望你能静下心来,把创刊以来的《文艺报》从头看一遍,这样就能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遗憾的是后来我因种种杂事,无法专心完成老师的指导,但老师对我的鼓励却给了我信心。

1985年秋,国家的一切逐渐走上正轨,全国上下都在奋起直追,以弥补荒废的十年。赵老师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满怀激情,准备全力投入教学及学术研究,为此他做了一个决定:去医院把困扰自己多年的腰椎问题解决。不料手术失败,刚入不惑的赵老师下股全失,失去知觉,而他的爱人张晚老师刚从外地调回北京,唯一的女儿阳阳只有三四岁。轰然一声大山倒塌,未来也许是无边的黑暗,我无法想象那一段老师度过了怎样的日日夜夜。第二年暑期回京,我立刻去探望赵老师,老师除了不能站起,

仍然是一如过往的精神饱满,坐在堆满书籍杂志的书桌前侃侃而谈:热闹的先锋文学、厚重的寻根文学……每提到一篇当时的热门作品,他都能细述情节分析结构臧否人物,这得是多大的阅读量!正是这样“全力投入”工作,使他没有念念于病痛的困扰。那以后,赵老师不仅主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几次修订了北大中文系当代室几位老师合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还坚持坐着轮椅去上课,带出来几届研究生。

我是特别愿意听赵老师讲话的,不论是在课堂上讲课,还是两三人闲聊。老师喜欢讲,他拒绝空泛和虚夸,不去说那些教科书上写就的概念,也很少提抽象的理论,只注重美感与直觉。几十年过去了,退休的他们将精力转向了创作,因为信任老师对小说敏锐的感知与独到的眼光,我把自己写的小说拿给老师看,老师对于我那



本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给予肯定,认为细节饱满,地域特色鲜明;但对我特别看重的那本家族历史小说却严厉批评,说我过于拘泥于现实中的人物

为了治疗,赵老师住进了养老院,我们几个当年的进修生准备去看望老师,但每次给老师打电话他都会说路太远,你们也不再年轻,就在电话里聊吧。是啊,我们也不再年轻,但每当我因病痛难忍而质问生命的意义时,耳边就会响起老师那清朗洒脱的声音。这是一

个做过八次大手术、每日要靠止痛药维持的八旬老人啊!可他总是用淡定的语气回答对自己病情的询问,仿佛疼痛折磨的不是他自身。而一谈起近期的小说和一些文学现象,语气变得热烈,思路仍是那样清晰,记忆十分扎实。

想到老师,我不敢再叫疼。赵老师不仅给我以学业上的指导,更给了我一重人生的启示:无论身处或身内的顺境与挫折,都是生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敬畏生命,便坦然地迎接生命的所有。

刘锡庆老师,那宽厚的胸膛

写起赵祖谟老师,自然会想起由赵老师为我引荐的另一位先生,已经离世的刘锡庆老师。刘锡庆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以写作学研究以及散文报告文学研究蜚声国内学界。20世纪90年代初,不记得是为了什么,赵老师对我说:“你可以去找找师大的刘锡庆老师。”赵老师随即给刘老师打电话介绍了我。我按老师给我的地址找到刘老师时在北师大的住处,一座老旧的红砖楼房。师母开了门,厨房似乎是迎着走进,我一进门就看到窄窄的过道对面窗前,半个高大宽厚的背影,似乎在灶前炒菜。我有些意外:这形象与我心中的名校名师似乎不搭界,同时又觉得自己来得真不是时候,便有些尴尬地站在窄小的门厅里。刘老师忙完活走出来,一张笑菩萨的脸,招呼我坐到摆在门厅里的方桌前,翻看我带去的自己的专著与论文。看到《张

洁的小说世界》,立刻说:“呃,这本书是你写的?我刚买了一本。”紧接着就说:“你可以给《文学评论》写文章。”我受宠若惊,《文学评论》,多么高大上的杂志,这是搞当代文学研究的入都期望能够在上面见到自己名字刊物啊。我清涕地看着眼前这位初次谋面,高大壮硕又慈眉善目的先生,不知该说什么。刘老师当即给《文学评论》编辑打电话,直截了当地说了几句,就把电话递给我。自那以后,我继续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介绍甘肃文学创作的文章,文学界同好关注这个西北偏远省份的文学创作,并认同甘肃作家作品中蕴含的“黄土魂魄”与“天马精神”,刘老师是第一推动人。

前一段从媒体上得知北师大中文系的任洪渊老师也去世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任洪渊以诗名世,后来听说他到了北师大任教,我还颇为惊讶。

最近看到任洪渊2018年纪念刘锡庆老师的文章,提到自己当年进北师大得力于刘老师“行事”的简洁明快”。刘老师与任洪渊当年曾是北师大同学,但二人并无多少交集,80年代初,任洪渊听到北师大中文系组建当代文学教研室,便动了回母校的心思,可他年过四十,又没有过硬的学历。当他找到负责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刘锡庆老师后,任洪渊写道:“到了他家里,他坐在书桌前浏览我带来的文学期刊。……品评了几句之后,他说出的话语震动了我:你来吧。中文系需要一个诗人或者作家,改变一下我们这里的气氛。”“改变一下我们这里的气氛”,那还是80年代前期,各高校还没有想到引进作家,刘老师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国内高校教学秩序的看法和学科建设的远见。

这就是刘锡庆老师,一位



真正的师长,热情、宽厚,无私地提携后辈,只看作品和成果,从不认关系。每次见老师之前,我总有些紧张,而一看到那宽厚的背影和那弥勒佛般的笑容,就会松弛下来。在《散文》一样的中文系中,任洪渊写道:“我第一眼就看到他明朗的面容,没有什么要掩饰的,也没有没有什么要张扬的。他的穿着,那么高大魁梧的身材,把那个年代的蓝色中山正装穿得那么

休闲,随意,有如性情散文的笔法,那么无主题的主题,无形式的形式。”诗人的语言,准确地描绘出学生眼中的刘锡庆老师。“坐在锡庆面前,谁都能看到他胸襟的明净……有这样明净胸襟的文人,太少了。”

是的,这就是刘锡庆老师,明朗、明快、明净,那宽厚的胸膛里,装着的一颗没有瑕疵的心。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退休教师) (本版插图:郭红松)